



古書整理參考資料

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

一九八〇年十月

编辑说明

为了配合我系《古籍整理》课程的教学，我们编辑了这本参考资料。

在编辑过程中，资料以普及性为着眼点进行收集，重点放在解放后，对于解放前的也适当撷取；主要是期刊论文，对于专著也少量摘录；涉及学术讨论的问题，注意不同观点的并存。资料依课程内容进行组织，为了方便读者查阅其他未选入的资料，附参考资料索引于后。

由于古籍整理涉及古学术的各个门类，我们的视野不开阔，则无以毕其功；资料的选取本应注意“博”的问题，由于部分课程参考资料，均已各司其职，为了避免重复之嫌，有些精采篇章也难排除雷同之讥；参考资料索引所列的篇章，力求较“博”，有与其他课程所列相同的，意在扩大视野，所占篇幅极为有限，读者当可鉴谅。

在编辑过程中，由于时间短、人手少、水平低，难免有顾此失彼、只见一斑未见全豹之弊，缺点和错误亦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参加本资料编辑的是教师廖延唐、张煜明和研究生曹直。

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

古籍整理小组

一九八〇年十月

目 录

四库全书凡例二十则	(1)
国学季刊发刊词	(4)
从《隋书·经籍志》看汉隋间历史撰述的发展	施 丁 (12)
购书	祁承爚 (20)
购求	孙从添 (22)
中文图书分类法沿革(古代书籍分类)	(23)
经部类目汇释	(28)
史部类目汇释	(47)
子部类目汇释	(80)
集部类目汇释	(100)
纠缪	焦 竑 (104)
编目	孙从添 (107)
谈谈古籍的揭示	卢中岳 (108)
帝号·谥号·庙号·陵号	楚 庄 (118)
浅谈用《中图法》改编线装书	谭联秀 孙德安 (120)
线装书的分类和目录问题	焦宗德 (132)
善本书的保管工作	陈恩惠 (135)
浅谈古籍的保护	蒋元卿 (139)
装订	孙从添 (141)
怎样装修善本旧书	袁良峰 (142)
收藏	孙从添 (144)
曝书	孙从添 (145)
中国地方志的起源、特征及其史料价值	朱士嘉 (146)
中国地方志浅说	朱士嘉 (154)
方志——史料的宝库	傅振伦 (162)
地方文献简论	于乃义 (164)
谈谈收集地方文献中的几个问题	高树榆 (171)

宋朝对于书报的管制·····	茆 公 (178)
乾隆焚书·····	左步青 (184)
校讎·····	孙从添 (196)
校讎略·····	郑 樵 (197)
校勘略说·····	蒋礼鸿 (205)
中国校讎学叙论·····	张舜徽 (219)
校勘·····	张舜徽 (233)
目录·····	张舜徽 (242)
谈谈印本书发展简史·····	赵万里 (257)
版本学与图书馆·····	顾廷龙 (263)
论古书版本学·····	李致忠 (267)
版本·····	张舜徽 (272)
版本研究与目录学的关系·····	汪应文 (285)
钞录·····	孙从添 (291)
鉴书·····	祁承埏 (294)
鉴别·····	孙从添 (297)
明代无锡会通馆印书是锡活字本·····	潘天祯 (299)
清代版本举要·····	宋效先 (303)
武英殿聚珍版及其识别问题·····	姚海泉 (306)
藏书印与版本鉴定概说·····	王 竟 (309)
略谈古籍版本鉴定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魏隐儒 (319)
版本鉴定中常见错误类型分析·····	王海燕 (326)
从古书的版本鉴定看版本的形式主义倾向·····	佟镇凯 (330)
“善本”浅谈·····	李致忠 (335)
古籍善本书著录浅说·····	丁 瑜 (340)
古籍善本简论·····	卢中岳 (345)
对古籍善本一些问题的看法·····	徐孝宓 (351)
附：参考资料索引·····	(363)

四库全书凡例二十则

是书卷帙浩博，为亘古所无。然每进一编，必经亲览，宏纲巨目，悉禀天裁。定千载之是非，决百家之疑似。权衡独运，衮钺斯昭。睿鉴高深，迥非诸臣管蠡之所及；随时训示，旷若发蒙。八载以来，不能一一殚记，谨录历次恭奉圣谕为一卷，载诸简端，俾共知我皇上稽古右文，功媲删述，悬诸日月，昭示方来，与历代官修之本，泛称御定者，迥不相同。

是书以经、史、子、集，提纲列目。经部分十类，史部分十五类，子部分十四类，集部分五类。或流别繁碎者，又各析子目，使条理分明。所录诸书，各以时代为次。其历代帝王著作，从隋书经籍志例，冠各代之首。至于列朝圣制、皇上御撰，揆以古例，当弁冕全书，而我皇上，道禀大公，义求至当，以四库所录，包括古今，义在衡鉴千秋，非徒取尊崇昭代，特命各从门目，弁于国朝著述之前。此尤圣裁独断，义惬理精，非馆臣所能仰赞一词者矣。

前代藏书，率无简择，萧兰并擷，珉玉杂陈，殊未协别裁之义。今诏求古籍，特创新规，一一辨厥妍媸，严为去取。其上者，悉登编录，罔致遗珠；其次者，亦长短兼胪，见瑕瑜之不掩；其有言非立训，义或违经，则附载其名，兼匡厥谬；至于寻常著述，未越群流，虽咎誉之咸无，要流传之已久，准诸家著录之例，亦并存其目，以备考核。等差有辨，旌别兼施，自有典籍以来，无如斯之博且精矣。

自隋志以下，门目大同小异，互有出入，亦各具得失。今择善而从。如诏令、奏议，文献通考入集部，今以其事关国政，诏令从唐志例入史部，奏议从汉志例亦入史部；东都事略之属，不可入正史，而亦不可入杂史者，从宋史例，立别史一门；香谱、麈谱之属，旧志无所附丽，强入农家，今从尤袤遂初堂书目例，立谱录一门；名家、墨家、纵横家，历代著录，各不过一二种，难以成帙，今从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例，并入杂家为一门；又别集之有诗无文者，文献通考别立诗集一门，然则有文无诗者，何不别立文集一门，多事区分，徒滋繁碎，今仍从诸史之例，并为别集一门；又兼诂群经者，唐志题曰经解，则不见其为群经，朱彝尊经义考题曰群经，又不见其为经解，徐乾学通志堂所刻改名曰总经解，何焯又讥其杜撰，今取隋志之文名之曰五经总义。凡斯之类，皆务求典故，非事更张。

焦竑国史经籍志，多分子目，颇以冗订为嫌。今酌乎其中，惟经部之小学类，史部之地理、传记、政书三类，子部之术数、艺术、谱录、杂家四类，集部之词曲类，流派至为繁伙，端绪易至茫如，谨约分小学为三子目，地理为九子目，传记为五子目，政书为六子目，术数为七子目，艺术、谱录各为四子目，杂家为五子目，词曲为四子目，使条理秩然。又经部之礼类，史部之诏令奏议类、目录类，子部之天文算法类、小说家类，亦各约分子目，以便检寻。其余琐节，概为删并。

古来诸家著录，往往循名失实，配隶乖宜；不但崇文总目以树萱录入之种植，为郑樵所讥。今并考校原书，详为釐定。如笔阵图之属，旧入小学类，今惟以论六书者入小学，其论八法者，不过笔札之工，则改隶艺术；羯鼓录之属，旧入乐类，今惟以论律吕者入乐，其论管弦工尺者，不过世俗之音，亦改隶艺术；左传类对赋之属，旧入春秋类，今以其但取俚辞，无关经义，改隶类书；孝经集灵旧入孝经类，穆天子传旧入起居注类，山海经，十洲记旧入地理类，汉武帝内传、飞燕外传旧入传记类，今以其或涉荒诞，或涉鄙猥，均改隶小说；他如扬雄太玄经旧入儒家类，今改隶术数，俞琰易外别传旧入易类，今改隶道家；又如倪石陵书名似子书，而实文集，陈植木钟集名似文集，而实语录；凡斯之流，不可殫述，并一一考核，务使不失其真。

诸书刊写之本不一，谨择其善本录之。增删之本亦不一，谨择其足本录之。每书名之下，钦遵谕旨，各注某家藏本，以不没所自。（按，四库总目每书名之下注明某家藏本，简明目录已略去。）其坊刻之书，不可专题一家者，则注曰通行本。至其编次先后，汉书艺文志以高帝、文帝所撰杂置诸臣之中，殊为非体；隋书经籍志以帝王各冠其本代，于义为允，今从其例。其余概以登第之年，生卒之岁，为之排比。或据所往来倡和之人为次。无可考者，则附本代之末。释道闺阁，亦各从时代，不复区分。宦侍之作，虽不宜厕士大夫闲，然汉志小学家，尝收赵高之爰历、史游之急就，今从其例，亦间存一二。外国之作，前史罕载，然既归王化，即属外臣，不必分疆绝界，故木增、郑麟趾、徐敬德之属，亦随时代编入焉。

诸书次序，虽从其时代；至于笺释旧文，则仍从所注之书，而不论作注之人。如儒家类明曹端太极图述解，以注周子之书，则列于张子全书前；国朝李光地注解正蒙，以注张子之书，则列于二程遗书前，是也。他如史记疑问，附史记后；班马异同，附汉书后之类，亦同此例，以便参考。至于汪瑄所辑之曾子、子思子，则仍列于宋；吕楠所辑之周子抄释诸书，则仍列于明；盖虽袁辑旧文，而实自为著述，与因原书而考辨者，事理固不同也。刘向校理秘文，每书具奏；曾巩刊定官本，亦各制序文。然巩好借题抒议，往往冗长，而本书之始末源流，转从疏略；王尧臣崇文总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书录解题，稍具崖略，亦未详明；马端临经籍考，荟萃群言，较为赅博，而兼收并列，未能贯串折衷。今于所列诸书，各撰为提要。分之，则散弁诸编；合之，则共为总目。每书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论世知人；次考本书之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皆详为订辨，巨细不遗。而人品学术之醇疵，国纪朝章之法戒，亦未尝不各昭彰瘁，用著劝惩。其体例悉承圣断，亦古来之所未有也。

四部之首，各冠以总序，撮述其源流正变，以挈纲领。四十三类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详述其分并改隶，以析条目。如其义有未尽，例有未该，则或于子目之末，或于本条之下，附注案语，以明通变之由。

历代敕撰官书，如周易正义之类，承诏纂修，不出一手，一一详其爵里，则末大于本，转病繁冗，故但记其成书年月，任事姓名，而不缕陈其爵里。又如汉之贾、董、唐之李、杜、韩、柳，宋之欧、苏、曾、王，以及韩、范、司马诸名臣，周、程、张、朱诸道学，其书并家弦户诵，虽村塾童竖，皆能知其为人，其爵里亦不复赘。至一人而著数书，分见于各部中者，其爵里惟见于第一部，后但云某人某书已著录，以省重复。如二书在

一卷之中，或数页之内，易于省记者，则第二部但著其名。（如：明戴原礼，已见所校补朱震亨金匱钩玄条下，其推求师意二卷，仅隔五条之类。）

刘綰有言：“意翻空而易奇，词征实而难巧。”儒者说经论史，其理亦然。故说经主于明义理，然不得其文字之训诂，则义理何自而推；论史主于示褒贬，然不得其事迹之本末，则褒贬何据而定。如成风为鲁僖公之母，明载左传，而赵鹏飞春秋经筌，谓不知为庄公之妾、为僖公之妾，是不知其人之名分，可定其礼之得失乎？刘子翼入唐为著作郎、宏文馆直学士，明载唐书刘祎之传，而朱子通鉴纲目，书贞观元年，征隋秘书刘子翼不至，尹起莘发明称特书隋官以美之，与陶潜称晋一例，是未知其人之始终，可定其品之贤否乎？今所录者，率考证精核，辩论明确为主，庶几可谢彼虚谈，敦兹实学。

文章流别，历代增新，古来有是一家，即应立是一类，作者有是一体，即应备是一格，斯协于全书之名。故释道外教、词曲末技，咸登简牍，不废搜罗。然二氏之书，必择其可资考证者，其经忏章咒，并凜遵谕旨，一字不收。宋人朱表青词，亦概从删削。其倚声填调之作，如石孝友之金谷遗音、张可久之小山小令，臣等初以相传旧本，姑为录存，并蒙皇上指示，命从屏斥。仰见大圣人敦崇风教，釐正典籍之至意。是以编辑虽富，而谨持绳墨，去取不敢不严。

圣贤之学，主于明体以达用，凡不可见诸实事者，皆属后言。儒生著书，务为高论，阴阳太极，累牍连篇，斯已不切人事矣。至于论九河，则欲修禹迹；考六典，则欲复周官；封建，井田，动称三代，而不揆时势之不可行；至黄谏之流，欲使天下笔札，皆改篆体，顾炎武之流，欲使天下言语，皆作古音，迂谬抑更甚焉。又如明之曲士人喜言兵、二麓正议，欲掘坑藏锥以刺敌；武备新书，欲雕木为虎以临阵；陈禹谟至欲使九边将士，人人皆读左传。凡斯之类，并辟其异说，黜彼空言，庶读者知致远经方，务求为有用之学。

汉、唐儒者，谨守师说而已；自南宋至明，凡说经讲学论文，皆各立门户，大抵数名人为之主，而依草附木者，器然助之。朋党一分，千秋吴越。渐流渐远，并其本师之宗旨，亦失其传，而缝隙相寻，操戈不已。名为争是非，而实则争胜负也。人心世道之害，莫甚于斯。伏读御题朱弁曲洧旧闻，致遗憾于洛党；又御题顾宪成泾皋藏稿，示炯戒于东林，诚洞鉴情伪之至论也。我国家文教昌明，崇真黜伪，翔阳赫耀，阴翳潜消，已尽涤前朝之敝俗。然防微杜渐，不能不虑远思深，故甄别遗编，皆一本至公，铲除畛域，以预消芽蘖之萌。至诗社之标榜声名，地志之矜夸人物，浮辞涂饰，不尽可凭，亦并详为考订，务核其真，庶几公道大彰，俾尚论者，知所劝戒。

文章德行，在孔门既已分科，两擅厥长，代不一二。今所录者，如龚诩、杨继盛之文集，周宗建、黄道周之经解，则论人而不论其书；耿南仲之说易、吴玠之评诗，则论书而不论其人。凡兹之类，略示变通。一则表章之公，一则节取之义也。至于姚广孝之逃虚子集，严嵩之铃山堂诗，虽词华之美，足以方轨文坛；而广孝则助逆兴兵，嵩则怙权蠹国，绳以名义，匪止微瑕。凡兹之流，并著其见斥之由，附存其目，用见圣朝彰善瘅恶，悉准千秋之公论焉。

儒者著书，往往各明一义，或相反而适相成，或相攻而实相救，所谓言岂一端，各有当也。考古者无所别裁，则多岐而太杂；有所专主，又胶执而过偏。左右佩剑，均未协

中。今所采录，惟离经畔道、颠倒是非者，掎击必严；怀诈挟私、荧惑视听者，屏斥必力。至于阐明学术，各擷所长，品鹭文章，不名一格，兼收并蓄，如渤澥之纳众流，庶不乖于全书之目。

七略所著古书，即多依托，班固汉书艺文志注可覆按也。迂流泊于明季，伪妄弥增，鱼目混珠，猝难究诘。今一一详核，并斥而存目，兼辨证其非。其有本属伪书，流传已久，或掇拾残剩，真赝相参，历代词人，已引为故实，未可概为捐弃，则姑录存而辨别之。大抵灼为原帙者，则题曰某代某人撰；灼为赝造者，则题曰旧本题某代某人撰；其踵误传讹如吕本中春秋传，旧本称吕祖谦之类，其例亦同。至于其书虽历代著录，而实一无可取，如燕丹子、陶潜圣贤群辅录之类，经圣鉴洞烛其妄者，则亦斥而存目，不使滥登。九流自七略以来，即已著录。然方技家递相增益，篇帙日繁，往往伪妄荒唐，不可究诘，抑或卑琐微末，不足编摩。今但就四库所储，择其稍古而近理者，各存数种，以见彼法之梗概。其所未备，不复搜求。盖圣朝编录遗文，以阐圣学、明王道者为主，不以百氏杂学为重也。

是书主于考订异同，别白得失，故辨驳之文为多。然大抵于众说互殊者，权其去取；幽光未耀者，加以表章。至于马、班之史，李、杜之诗，韩、柳、欧、苏之文章，濂、洛、关、闽之道学，定论久孚，无庸更赘一语者，则但论其刊刻传写之异同，编次增删之始末，著是本之善否而已。盖不可不辨者，不敢因袭旧文；无可复议者，亦不敢横生别解。凡以求归至当，以昭去取之至公。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

国 学 季 刊 发 刊 词^①

——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

近年来，古学的大师渐渐死完了，新起的学者还不曾会有什么大成绩表现出来。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时期，只有三五个老辈在那里支撑门面。古学界表面上的寂寞，遂使许多人发生无限的悲观。所以有许多老辈遂说“古学要沦亡了！”“古书不久要无人能读了！”

在这个悲观呼声里，很自然的发出一种没气力的反动的运动来。有些人还以为西洋学术思想的输入是古学沦亡的原因，所以他们至今还在那里抗拒那他们自己也莫名其妙的西洋学术。有些人还以为孔教可以完全代表中国的古文化，所以他们至今还梦想孔教的复兴；甚至于有人竟想抄袭基督教的制度来光复孔教。有些人还以为古文古诗的保存就是古学的保存了；所以他们至今还想压制语体文字的提倡与传播。至于那些静坐扶乩，逃向迷信里去自寻安慰的，更不用说了。

① 原载《国学门季刊》第一期，一九二五年尚有一种《国学门周刊》出版。

在我们看起来，这些反动都只是旧式学者破产的铁证；这些行为，不但不能挽救他们所忧虑的国学之沦亡，反可以增加国中少年人对千古学的藐视。如果这些举动可以代表国学，国学还是沦亡了更好！

我们平心静气的观察这三百年古学发达史，再观察眼前国内和国外的学者研究中国学术的现状，我们不但抱不悲观，并且还抱无穷的乐观。我们深信，国学的将来，定能远胜国学的过去；过去的成绩虽然未可厚非，但将来的成绩一定还要更好无数倍。

自从明末到于今，这三百年，诚然可算是古学昌明时代。总括这三百年的成绩，可分这些方面：

(一)整理古书。在这方面，又可分三门。第一，本子的校勘；第二，文字的训诂；第三，真伪的考订。考订真伪一层，乾嘉的大师（除了极少数学者如崔述等之外）都不很注意；只有清初与晚清的学者还肯做这种研究，但方法还不很精密，考订的范围也不大。因此，这一方面的整理，成绩比较的就最少了。然而校勘与训诂两方面的成绩实在不少。戴震、段玉裁、王念孙、阮元、王引之们的治“经”，钱大昕、赵翼，王鸣盛、洪亮吉们的治“史”，王念孙、俞樾、孙诒让们的治“子”；戴震、王念孙、段玉裁、邵晋涵、郝懿行、钱锺、王筠、朱骏声们的治古词典：都有相当的成绩。重要的古书，经过这许多大师的整理，比三百年前就容易看的多了。我们试拿明刻本的《墨子》来比孙诒让的《墨子间诂》，或拿二徐的《说文》来比清儒的各种《说文》注，就可以量度这几百年整理古书的成绩了。

(二)发现古书。清朝一代所以能称为古学复兴时期，不单因为训诂校勘的发达，还因为古书发现和翻刻之多。清代中央政府，各省书局，都提倡刻书。私家刻的书更为重要：丛书与单行本；重刊本，精校本，摹刻本，近来的影印本。我们且举一个最微细的例。近三十年内发现与刻行的宋元词集，给文学史家添了多少材料？清初朱彝尊们固然见着不少的词集；但我们今日购买词集之便易，却是清初词人没有享过的福气了。翻刻古书孤本之外，还有辑佚书一项，如《古经解诂》、《小学钩沉》、《玉函山房辑佚书》和《四库全书》里那几百种从《永乐大典》辑出的佚书，都是国学史上极重要的贡献。

(三)发现古物。清朝学者好古的风气不限于古书一项；风气所被，遂使古物的发现，记载，收藏，都成了时髦的嗜好，鼎彝，泉币，碑版，壁画，雕塑，古陶器之类，虽缺乏系统的整理，材料确是不少了。最近三十年来，甲骨文字的发现，竟使殷商一代的历史有了地底下的证据，并且给文学添了无数的最古材料。最近辽阳河南等处石器时代的文化的发现，也是一件极重要的事。

但这三百年的古学的研究，在今日估计起来，实在还有许多缺点。三百年的第一流学者的心思精力都用在这一方面，而究竟还只有这一点点结果，也正是因为有这些缺点的缘故。那些缺点，分开来说，也有三层：

(一)研究的范围太狭窄了。这三百年古学，虽然也有整治史书的，虽然也有研究子书的，但大家的眼光与心力注射的焦点，究竟只在儒家的几部经书。古韵的研究，古诗词的研究，古书旧注的研究，子书的研究，都不是为这些材料的本身价值而研究的。一切古学都只是经学的丫头！内中固然也有婢作夫人的，如古韵学之自成一种专门学问，如

子书的研究之渐渐脱离经学的羁绊而独立。但学者的聪明才力被几部经书笼罩了三百年，那是不可讳的事实。况且在这个狭小的范围里，还有许多更狭小的门户界限。有汉学和宋学的分家，有今文和古文的分家，甚至于治一部《诗经》还要舍弃东汉的郑笺而专取西汉的毛传。专攻本是学术进步的一个条件；但清儒狭小研究的范围，却不是没有成见的分功。他们脱不了“儒书一尊”的成见，故全力治经学，而只用余力去治他书。他们又脱不了“汉儒去古未远”的成见，故迷信汉人，而排除晚代的学者。他们不知道材料固是愈古愈可信，而见解则后人往往胜过前人；所以他们力排郑樵、朱熹而迷信毛公郑玄。今文家稍稍能有独立的见解了；但他们打倒了东汉，只落得回到西汉的圈子里去。研究的范围的狭小是清代学术所以不能大发展的一个绝大原因。三五部古书，无论怎样绞来挤去，只有那点精华和糟粕。打倒宋朝的“道士《易》”固然是好事；但打倒了“道士《易》”，跳过了魏晋人的“道家《易》”，却回到两汉的“方士《易》”，那就是很不幸的了。《易》的故事如此；《诗书春秋三礼》的故事也是如此。三百年的心思才力，始终不曾跳出这个狭小的圈子外去。

(二)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学问的进步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材料的积聚与剖解；一是材料的组织与贯通。前者须靠精勤的功力，后者全靠综合的理解。清儒有鉴于宋明学者专靠理解的危险，所以努力做朴实的功力而力避主观的见解。这三百年之中，几乎只有经师，而无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无史家；只有校注，而无著作。这三句话虽然很重，但我们试除去戴震、章学诚、崔述几个人，就不能不承认这三句话的真實了。章学诚生当乾隆盛时（乾隆，一七三六——一七九五年，章学诚，一七三八——一八〇〇）大声疾呼的警告当日的学术界道：“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劳神于经传子史，而终身无得于学者，正坐……误执求知之功力，以为学即在是尔。学与功力实相似而不同。学不可以骤几，人当致攻乎功力，则可耳。指功力以为学，是犹指秫黍以为酒也。”（《文史通义·博约篇》）。

他又说：

“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蚕食叶而不能抽丝。”（《章氏遗书》·与汪辉祖书）古人说：“鸳鸯绣取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单把绣成的鸳鸯给人看，而不肯把金针教人，那是不大度的行为。然而天下的人不是人人都能学绣鸳鸯的；多数人只爱看鸳鸯的而不想自己动手去学绣。清朝的学者只是天天一针一针的学绣，始终不肯绣鸳鸯。所以他们尽管辛苦殷勤的做去，而在社会的生活思想上几乎全不发生影响。他们自以为打倒了宋学，然而全国的学校里读的书仍旧是朱熹的《四书集注》、《诗集传》、《易本义》等书。他们自以为打倒了伪古文《尚书》，然而全国的村学堂里的学究仍旧继续用蔡沈的《书集传》。三百年第一流的精力，二千四百三十卷的《经解》，仍旧不能替换朱熹一个人的几部启蒙的小书！这也可见单靠功力而不重理解的失败了。

(三)缺乏参考比较的材料。我们试问，这三百年的学者何以这样缺乏理解呢？我们推求这种现象的原因，不能不回到第一层缺点——研究的围范的过于狭小。

宋明的理学家所以富于理解，全国为六朝唐以后佛家与道士的学说弥漫空气中，宋明的理学家全都受了他们的影响，用他们的学说作一种参考比较的资料。宋明的理学家，有

了这种比较研究的材料，就像一个近视眼的人戴了近视眼镜一样；从前看不见的，现在都看见了；从前不明白的，现在都明白了。同是一篇《大学》，汉魏的人不很注意他，宋明的人忽然十分尊崇他，把他从《礼记》里抬出来，尊为《四书》之一，推为“初学入德之门”。《中庸》也是如此的。宋明的人戴了佛书的眼镜，望着《大学》《中庸》，便觉得“明明德”“诚”“正心诚意”“率性之谓道”等等话头都有哲学的意义了。清朝的学者深知戴眼镜的流弊，决意不配眼镜；却不知道近视而不戴眼镜，同瞎子相差有限。说《诗》的回到《诗序》，说《易》的回到“方士《易》”，说《春秋》的回到《公羊》，可谓“陋”之至了；然而我们试想这一班第一流才士，何以陋到这步田地，可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高明的参考资料吗？他们排斥“异端”；他们得着一部一切经音义，只认得他有保存古韵书古词典的用处；他们拿着一部子书，也只认得他有旁证经文古义的功用。他们只向那几部儒书里兜圈子，兜来兜去，始终脱不了一个“陋”字！打破这个“陋”字，没有别的法子，只有旁搜博采，多寻参考比较的材料。

以上指出的这三百年的古学研究的缺点，不过是随便挑出了几樁重要的。我们的意思并不不要菲薄这三百年的成绩；我们只想指出他们的成绩所以不过如此的原因。前人上了当，后人应该学点乖。我们借鉴于先辈学者的成功与失败，然后可以决定我们现在和将来研究国学的方针。我们不研究古学则已；如要想提倡古学的研究，应该注意这几点：

(一)扩大研究的范围。

(二)注意系统的整理。

(三)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

(一)怎样扩大研究的范围呢？“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他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国故”包括“国粹”；但他又包含“国渣”。我们若不了解“国渣”，如何懂得“国粹”？所以我们现在要扩充国学的领域，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过去文化，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认清了“国故学”的使命，是整理中国一切文化历史，便可以把一切狭隘的门户之见都扫空了。例如治经，郑玄王肃在历史上固然占一个位置，王弼、何晏也占一个位置，王安石、朱熹也占一个位置，戴震、惠栋也占一个位置，刘逢禄、康有为也占一个位置。段玉裁曾说：

校经之法，必以贾还贾，以孔还孔，以陆还陆，以杜还杜，以郑还郑，各得其底本，而后判其义理之是非。……不先正《注》，《疏》，《释文》之底本，则多诬古人。不断其立说之是非，则多误今人。……（《经韵楼集》，与《诸同志书论校书之难》。）

我们可惜他论校书的话来总论国学；我们也许可以说：整治国故，必须以汉还汉，以魏晋还魏晋，以唐还唐，以宋还宋，以明还明，以清还清；以古文还古文家，以今文还今文家，以程、朱还程、朱，以陆、王还陆、王，各还他一个本来面目，然后评判各代各家各人的义理的是非。不还他们的本来面目，则多诬古人。不评判他们的是非，则多误今人。但不先弄明白了他们的本来面目，我们决不配评判他们的是非。

这还是专为经学哲学说法。在文学的方面，也有同样的需要。庙堂的文学固可以研究，但草野的文学也应该研究。在历史的眼光里，今日民间小儿女唱的歌谣，和《诗三百篇》有同等

的位置；民间流传的小说和高文典册有同等的位置，吴敬梓、曹沾和关汉卿、马东篱和杜甫、韩愈有同等的位置。故在文学方面，

也应该把《三百篇》还给西周东周之间的无名诗人，把《古乐府》还给汉魏六朝的无名诗人，把唐诗还给唐，把词还给五代两宋，把小曲杂剧还给元朝，把明清的小说还明清，每一个时代，还他那个时代的特长的文学，然后评判他们的文学的价值。不认清每一个时代的特殊文学，则多诬古人而多误今人。

近来颇有人注意戏曲和小说了；但他们的注意仍不能脱离古董家的习气。他们只看得起宋人的小说，而不知道在历史的眼光里，一本石印小字的《平妖传》和一部精刻的残本《五代史平话》有同样的价值，正如《道藏》里极荒谬的道教经典和《尚书》《周易》有同等的研究价值。

总之，我们所谓“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只是要我们大家认清国学是国故学，而国故学包括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历史是多方面的：单记朝代兴亡，固不是历史；单有一宗一派，也不成历史。过去种种，上自思想学术之大，下至一个字，一支山歌之细，都是历史，都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

(二)怎样才是“注意系统的整理”呢？学问的进步不单靠积聚材料，还须有系统的整理。系统的整理可分三步说：

(甲)索引式的整理。不曾整理的材料，没有条理，不容易检寻，最能销磨学者有用的精神才力，最足阻碍学术的进步。若想学问进步增加速度，我们须想出法子来解放学者的精力，使他们的精力用在最经济的方面。例如一部《说文解字》，是最没有条理系统的；向来的学者差不多全靠记忆的苦工夫，方才能用这部书。但这种苦工夫是最不经济的；如果有人把《说文》重新编制一番（部首依笔画，每部的字也依笔画），再加上一个检字的索引（略如《说文通检》或《说文易检》，）那就可省许多无谓的时间与记忆力了，又如一部《二十四史》，有了一部《史姓韵编》，可以省多少精力与时间？清代的学者也有见到这一层的，如章学诚说：

窃以典籍浩繁，闻见有限；在博雅者且不能悉究无遗，况其下乎？校讎之先，宜盖取四库之藏，中外之籍，择其中之人名地名官阶书目，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数可稽者，略仿《佩文韵府》之例，悉编为韵；乃于本韵之下，注明原书出处，及先后篇第；自一见再见，以至数千百，皆详注之；藏之馆中，以为群书之总类。至校书之时，遇有疑似之处，即名而求其编韵，因韵而检其本书，参互错综，即可得其至是。此则渊博之儒穷毕生年力而不可究殚者，今即中才校勘可坐收于几席之间，非校讎之良法欤？（《校讎通义》）

当日的学者如朱筠、戴震等，都有这个见解，但这件事不容易做到，直到阮元得势力的时候，方才集合许多学者，合力做成一部空前的《经籍纂诂》，“展一韵而众字毕备，检一字而诸训皆存，寻一训而原书可识”（王引之序）；“即字而审其义，依韵而类其字，有本训，有转训，次叙布列，若网在纲”（钱大昕序）。这种书的功用，在于节省学者的功力，使学者不疲于功力之细碎，而省出精力来做更有用的事业。后来这一类的书被科场士子用作夹带的东西，用作抄窃的工具，所以有许多学者竟以用这种书为可耻的事。这是大错的。这一类“索引”式的整理，乃是系统的整理的最低而最不可少的一步，没有这一步的预备，国

学止限于少数有天才而又有间空工夫的少数人；并且这些少数人也要因功力的拖累而减少他们的成绩。偌大的事业，应该有许多人分担去做的，却落在少数人的肩膀上；这是国学所以不能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我们主张，国学的系统的整理的第一步是提倡这种“索引式的整理，把一切大部的书或不容易检查的书，一概编成索引，使人人能用古书。人人能用古书，是提倡国学的第一步。

（乙）结账式的整理。商人开店，到了年底，总要把这一年的账结算一次，要晓得前一年的盈亏和年底的存货，然后继续进行，做明年的生意。一种学术到了一个时期，也有总结账的必要。学术上的结账的用处有两层：一是把这一种学术里已经不成问题的部分整理出来，交给社会；二是把那不能解决的部分特别提出来，引起学者的注意。使学者知道何处有隙可乘，有功可立，有困难可以征服。结账是（一）结束从前的成绩，（二）预备将来努力的新方向。前者是预备普及的，后者是预备继长增高的。古代结账的书，如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如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如唐宋的《十三经注疏》，如朱熹的《四书》、《诗集传》、《易本义》等，所以都在后世发生很大的影响，全是这个道理。三百年来，学者都不肯轻易做这种结账的事业。二千四百多卷的《清经解》，除了极少数之外，都只是一堆“流水”烂账，没有条理，没有系统；人人从“粤若稽古”“关关雎鸠”说起，人人做的都是“杂记”式的稿本！怪不得学者看了要“望洋兴叹”了；怪不得国学有沦亡之忧了。我们试看科举时代投机的书坊肯费整年的工夫来编一部“《皇清经解》缩本编目”，便可以明白索引式的整理的需要；我们又看那时代的书坊肯费几年的工夫来编一部“《皇清经解》分经汇纂”，便可以明白结账式的整理的需要了。现在学问的途径多了，学者的时间与精力更有经济的必要了。例如《诗经》，二千年研究的结果，究竟到了什么田地，很少人说得出的；只因为二千年的《诗经》烂账至今不曾有一次的总结算。宋人驳了汉人，清人推翻了宋人，自以为回到汉人；至今《诗经》的研究，音韵自音韵，训诂自训诂，异文自异文，序说自序说，各不相关连。少年的学者想要研究《诗经》的，伸头望一望，只见一屋子的烂账簿，吓得吐舌缩不进去，只好叹口气，“算了罢！”《诗经》在今日所以渐渐无人过问，是少年人的罪过呢？还是《诗经》的专家的罪过呢？我们若想少年学者研究《诗经》，我们应该把《诗经》这笔烂账结算一遍，造成一笔总账。《诗经》的总账里应该包括这四大项：

（A）异文的校勘：总结王应麟以来直到陈乔枏李富孙等校勘异文的账。

（B）古韵的考究：总结吴棫朱熹陈第顾炎武以来考证古韵的账。

（C）训诂：总结毛公郑玄以来直到胡承珙马瑞辰陈奂二千多年训诂的账。

（D）见解（序说）：总结《诗经》、《诗辨妄》、《诗集传》、《伪诗传》、姚际恒、崔述、龚橙、方玉润……等二千年猜谜的账。

有了这一本总账，然后可以使大多数的学子容易踏进“《诗经》研究”之门：这是普及。入门之后，方才希望可以希望他们之中有些人出来继续研究那总账里未曾解决的悬账：这是提高。《诗经》如此，一切古书古学都是如此。我们试看前清用全力治经学，而经学的书不能流传于社会，倒是那几部用余力做的《墨子间诂》、《荀子集解》、《庄子集释》一类结账式的书流传最广。这不可以使我们觉悟结账式的整理的重要吗？

（丙）专史式的整理。索引式的整理是要使古书人人能用；结账式的整理是使古书人人能读：这两项都是提倡国学的设备。但我们在上文曾主张，国学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国

的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国学的系统的研究，要以此为归宿。一切国学的研究，无论时代古今，无论问题大小，都要朝着这一个大方向走。只有这个目的可以整统一切材料；只有这个任务可以容纳一切努力；只有这种眼光可以破除一切门户畛域。

我们理想中的国学研究，至少有这样的一个系统：

中国文化史：

- 一 民族史
- 二 语言文字史
- 三 经济史
- 四 政治史
- 五 国际交通史
- 六 思想学术史
- 七 宗教史
- 八 文艺史
- 九 风俗史
- 十 制度史

这是一个总系统。历史不是一件人人能做的事；历史家须要有两种必不可少的能力：一是精密的功力，一是高远的想像。没有精密的功力，不能做搜求和评判史料的工夫；没有高远的想像力，不能构造历史的系统。况且中国这么大，历史这么长，材料这么多，除了分功合作之外，更无他种方法可以达到这个大目的。但我们又觉得，国故的材料太纷繁了，若不先做一番历史的整理工夫，初学的人实在无从下手，无从入门。后来的材料也无所统属；材料无所统属，是国学纷乱烦碎的重要原因。所以我们主张，应该分这几个步骤：

第一，用现在力所能搜集考定的材料，因陋就简的先做成各种专史，如经济史，文学史，哲学史，数学史，宗教史，……之类。这是一些大间架，他们的用处只是要使现在和将来的材料有一个附丽的地方。

第二，专史之中，自然还可分子目，如经济史可分时代，又可分区域；如文学史哲学史可分时代，又可分宗派，又可专治一人；如宗教史可分时代，可专治一教，或一宗派，或一派中的一人。这种子目的研究是学问进步必不可少的条件。治国学的人应该各就“注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者”，用历史的方法与眼光去担任一部分的研究。子目的研究是专史修正的唯一源头，也是通史修正的唯一源头。

(三)怎样“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呢？向来的学者误认“国学”的“国”字是国界的表示，所以不承认“比较的研究”的功用。最浅陋的是用“附会”来代替“比较”：他们说基督教是墨教的绪余，墨家的“巨子”即是“矩子”，而“矩子”即是十字架！……附会是我们应该排斥的，但比较的研究是我们应该提倡的。有许多现象，孤立的说来说去，总说不通，总说不明白；一有了比较，竟不须解释，自然明白了。例如一个“之”字，古人说来说去，总不明白；现在我们懂得西洋文法学上的术语，只必说某种“之”字是内动词（由是而之焉），某种是介词（贼夫人之子），某种是指物形容词（之子于归），某种是代名词的第三身用在目的位（爱之能勿劳乎），就都明白分明了。又如封建制度，向来被那方块头的分

封说欺骗了，所以说来说去，总不明白；现在我们用欧洲中古的封建制度和日本的封建制度来比较，就容易明白了。音韵学上，比较的研究最有功效。用广东音可以考《侵覃》各韵的古音，可以考古代入声各韵的区别。近时西洋学者如 Karlgren，如 Baron von Stael-Holstein，用梵文原本来对照汉文译音的文学，很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古音学上的许多困难问题。不但如此：日语里，朝鲜语里，安南语里，都保存有中国古音可以供我们参考比较。西藏文自唐朝以来，音读虽变了，而文字的拼法不曾变，更可以供我们的参考比较，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中国古音里许多奇怪的复辅音呢。制度史上，这种比较的材料也极重要。懂得了西洋的议会制度史，我们更可以了解中国御史制度的性质与价值；懂得了欧美高等教育制度史，我们更能了解中国近一千年来的书院制度的性质与价值。哲学史上，这种比较的材料已发生很大的助力了。《墨子》里的《经上下》诸篇，若没有印度因明学和欧洲哲学作参考，恐怕至今还是几篇无人能解的奇书。韩非、王莽、王安石、李贽……一班人，若没有西洋思想作比较，恐怕至今还是沉冤莫白。看惯了近世国家注重财政的趋势，自然不觉得李觏王安石的政治思想的可怪了。懂得了近世社会主义政策，自然不能不佩服王莽王安石的见解和魄力了。《易系辞传》里“易者，象也”的理论，得柏拉图的“法象论”的比较而更明白；荀卿书里“类不悖，虽久同理”的理论，得亚里士多德的“类不变论”的参考而更易懂。这都是很明显的例。至于文学史上，小说戏曲近年忽然受学者的看重，民间俗歌近年渐渐引起学者的注意，都是和西洋文学接触比较的功效更不消说了。此外，如宗教的研究，民俗的研究，美术的研究，也都是不能不利用参考比较的材料的。

以上随便举的例，只是要说明比较参考的重要。我们现在治国学，必须要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要存比较研究的虚心。第一，方法上，西洋学者研究古学的方法早已影响日本的学术界了，而我们还在冥行索涂的时期。我们此时正应该虚心采用他们的科学的方法，补救我们没有条理系统的习惯。第二，材料上，欧美日本学术界有无数的成绩可以供我们的参考，比较，可以给我们开无数新法门，可以给我们添无数借鉴的镜子。学术的大仇敌是孤陋寡闻；孤陋寡闻的唯一良药是博采参考比较的材料。

我们观察这三百年的古学史，研究这三百年的学者的缺陷，知道他们的缺陷都可以补救的；我们又返观现在古学研究的趋势，明白了世界学者供给我们参考比较的好机会，所以我们对于国学的未来，不但不抱悲观，并且还抱无穷的乐观。我们认清了国学前途的黑暗与光明全靠我们努力的方向对不对。因此，我们提出三个方向来做我们一班同志互相督责勉励的条件：

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

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材料。

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

从《隋书·经籍志》 看汉隋间历史撰述的发展

施 丁

(一)“正史”的独尊

《隋书·经籍志》专为历史书设立史部，并分为十三类。第一类曰“正史”。正史为纪传体，以纪帝王的“纪”为纲，以纪将相大臣宗室外戚的“传”为纬，突出君君臣臣的观念和君臣的地位。《隋志》云：“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国史，以纪言行，后世多务，其道弥繁。……”按照此说，似乎正史起源甚早。但实际上，其著录正史，自《史记》开始。又在叙述司马迁著《史记》、班固著《汉书》、刘珍等著《东观汉记》、陈寿著《三国志》等情况之后，曰：“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自汉至隋，代有其作，一部接着一部，没有断线。甚至“一代之史，至数十家”。如著录关于东汉史的著作有九家九部，关于晋史的著作也有八家八部，足见拟班、马而作正史者之广。如果再参诸“古史”类著录的情况来看，所谓“一代之史，至数十家”之说，并不夸张。

《史记》、《汉书》、《东观汉记》等三部正史问世后，世人颇为重视，称之“三史”，很多学者专心研读。如，孟光“尤锐意三史”（《三国志·蜀书·孟光传》）；刘耽“明习《诗》、《礼》、三史”（《晋书·刘耽传》）；阚骠“三史群言，经目则诵”（《魏书·阚骠传》）；潘徽“尤精三史”（《隋书·文学传》）。学“三史”者之中，尤以学《汉书》为最突出。如，隋代刘臻“精于《两汉书》，时人称为汉圣”（《隋书·刘臻传》）。“《汉书》学者以萧（该）、包（恺）二人为宗匠。聚徒教授，著录者数千人。”（《隋书·儒林·包恺传》），李密“师事”包恺，“受《史记》、《汉书》，励精忘倦，恺门徒皆出其下”（《隋书·李密传》）。他牧牛时，骑在牛背上，“挂《汉书》一帙（牛）角上，行且读之。”（《唐书·李密传》）当时，“三史”不仅盛行于国内，而且流传到国外^①，发生了深广的影响。

在《隋志》正史类中，还著录有一些正史注释训诂和考据评论之作，如：有关《史记》的有四家，有关《汉书》的有二十二家。

^① 唐初李延寿所撰《北史》卷九十四《高丽传》记述，高丽“书有《五经》、《三史》、《三国志》、《晋阳秋》。”可见唐以前“三史”已传到高丽。《旧唐书》卷一九九上《高丽传》记述，高丽“俗爱书籍”，“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曄《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春秋》、《玉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尤爱重之。”这更具体地说明《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等史籍，受到高丽的爱重。

在正史方面，为什么“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为什么“一代之史，至数十家”？为什么会有“三史”之学？为什么注评《史记》者只有四家，而注论《汉书》者则有二十余家？为什么“梁时，明《汉书》有刘显、韦棱，陈时有姚察，隋代有包恺，萧该，并为名家。《史记》传者甚微”？《隋志》只是说明现象。并未指出原因。我觉得，自司马迁以作史为“名山”事业，写出了不朽的名著《史记》，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有志于史学之上，继踵努力，争先恐后，故“作者尤广”，更主要的是，纪传体正史，特别是班固《汉书》以断代为史，记西汉一代的兴亡成败，更适合历代统治者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维持切身统治利益的需要，故“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注意“皆拟班、马”一语，将晚于马的班，安排在马之前，是强调“拟班”，实际上后来都是“拟班”而作“一代之史”，而不“拟马”通古今之变（除梁武帝《通史》而外）。正因如此，以《汉书》“名家”者众，注《汉书》者亦多。

《隋志》的正史类，实是由阮氏《七录》的“国史”部演化出来的。阮氏《七录》“国史”部实包有《隋志》所列的“正史”、“古史”、“杂史”等方面的内容。《隋志》把“正史”和“古史”、“杂史”等区别开来，不笼统地称曰“国史”，是有其用意的。《隋志》古史类著录《汉纪》、《后汉纪》、《汉魏春秋》、《晋纪》等三十四部，其内容也多是“一代之史”；而且其历史悠久，“多依《春秋》之体”，纪帝王将相之事，为什么不能称为“正史”（按：《明史·艺文志》列编年体古史于正史类）？为什么不能列为第一类？主要原因就是，因其不能更适合于各代统治的需要。《隋志》杂史类所著录的著作，“大抵皆帝王之事”，为什么不再列为“国史”或加入“正史”？主要原因就在于，“其属辞比事，皆不与《春秋》、《史记》、《汉书》相似，盖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也”；且其“体例不经”；“又有委巷之说，迁怪妄诞，真虚莫测”，换句话说，就是不符合“正史”的标准。所以仅可供“博采广览，以酌其要”，而不能列为“正史”。

所谓“霸史”，是指有关十六国史等等的著作。《隋志》霸史类著录了《赵书》、《汉之书》、《秦书》，等等二十七部。这些书，既是偏霸政权的“一代之史”，又有些是纪传的体制，为什么不称正史？这是对“五胡”所建政权及其臣子“纪录”的轻视和排挤。

由是可见，正史的独尊地位，反映了当时封建统治者的封建正统观念，及其封建统治的需要，而且对后一千多年的史学产生了严重影响。

“起居注”是由近侍之臣“录纪人君言行动止之事”。如果说“正史”、“古史”、“杂史”和“霸史”等是“国史”性质的撰述；那末，“起居注”则是记注，是备著述“正史”帝纪之用的。

将《隋志》中几类“国史”性质的撰述与记注加起来，有244部，5190卷，其部数约占史部总数的30%，卷数约占史部总数的40%，由此可见，封建统治者对“国史”的重视。

（二）典志的繁杂

“正史”、“古史”、“杂史”、“霸史”等是纪帝王将相之事；而“旧事”、“职官”、“仪注”、“刑法”等是纪朝廷政法礼仪之典制。这种典志史书，汉隋之际较为繁杂。《隋志》“旧事”类著录《西京杂记》、《汉、魏、吴、蜀旧事》、《东宫典记》等等